

焦点透视

编者按

“三孩”政策落地后,其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制定和落地备受关注。近日,“三孩政策背景下的积极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亲职与劳动力市场的平衡、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女性发展与公共照料体系构建、相关国际经验的借鉴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积极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国际经验和中国方案

——关注“三孩政策背景下的积极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研讨会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三孩”政策落地后,其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制定和落地备受关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与家庭研究室与《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三孩政策背景下的积极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亲职与劳动力市场的平衡、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女性发展与公共照料体系构建、相关国际经验的借鉴等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素琴在致辞中表示,希望本次研讨会能立足中国国情,通过国际比较,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发掘有价值的对策建议,在促进婴幼儿健康发展的同时推动男女平等与妇女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在主题报告中指出,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所体现的中国人口负增长带有超低生育水平、区域不平衡与加速的特质,各地区应更加重视人口与生育问题。因此,在我国的现实与政策背景下,如何构建积极生育的配套支持措施成为此次研讨会的关注焦点。

亲职与劳动力市场的平衡

作为生育与养育的主要承担者,双亲的亲职问题对于积极生育至关重要。在亲职困局单元,专家学者重点探讨了亲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蒙克提出“预期性母职惩罚”的概念,即劳动力市场基于对女性求职者未来生育状况的预期,对未育女性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构成就业机会的阻碍或“惩罚”。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田野实验的证据,蒙克指出我国存在预期性母职惩罚的现象。实验分析初步证明,促进女性弹性就业

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减少“预期性母职惩罚”很关键。

从关系性视角出发,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对夫妻职业轨迹的分化进行了研究,她呼吁国家需要自上而下地倡导男性顾家、限制男性职场工作时间和长时间的工作文化,引导男性个体向工作、家庭、休闲三者平衡的生活方式转变。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者罗艳尝试对农村中亲职参与不足的单亲父亲进行社会工作干预,通过改变这些父亲的养育认知,增加亲子互动技能,令他们增强担当父职的信心。她提出,父亲参与育儿需要鼓励、肯定和支持。此种干预不仅有利于儿童,对单亲父亲这一群体也有一定社会意义。

市场化照料日益成为弥补家庭照料资源不足的重要选项,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肖素未探讨了家政市场化发展如何影响家政服务中雇主与家政工之间的关系。初步研究发现,雇主和家政工之间需要建立基于人情原则的“特殊性关系”才能实现相对理想的照料结果,这一发现对于思考家政市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参照。

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女性发展与公共照料体系构建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生育不仅是私领域内对个体尤其是女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人决策,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女性发展与公共照料体系构建,成为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施芸卿以上海妈妈团共同育儿为个案,解释了被私人化的抚育是如何尝试重新扩展为公共性问题的。她指出这一尝试对社会再生产有一定的意义,但需解决持续发展的机制问题。中华女

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授李洁则从提升再生产的价值出发,探讨了如何发掘全职妈妈的主体性,让她们从家庭走向社区,构建以妈妈们为主体的参与式社区支持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年学者杭苏红基于中产全职妈妈的话语和实践,反思了以往认为只有工作是女性“自我实现”的单维价值体系,指出还应重视职业之外的精神成长、家庭照料等拓展自我价值的新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满琪则通过对“虎妈”群体的访谈分析,探讨了密集育儿的共享现实如何对“虎妈”群体的情绪和群际行为产生影响。

家庭的育儿决策与可获得的照料资源紧密相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钟晓慧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提出,当家庭无法协调“一老一小”两种照顾需求时,生育意愿会降低。她建议国家在照料资源的代际分配上发挥主导作用,避免对老年人照料资源的挤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编辑陈偲则从需求侧出发讨论了大城市儿童早期照料的家庭需求,提出政府应重视家庭在儿童早期照料上的方式、可选择空间、性别平衡、托育服务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需求。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提出,期待在短期内弥补生育赤字,给想生而不敢生的家庭一个支持平台。无论家庭选择怎样的照料方式,政府应首先给家庭提供可选项,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她认为,三孩配套政策的意义在于,为普遍提高生育意愿、为承担抚育责任的个人和家庭提供一种系统性的支持。

国际经验的借鉴和探讨

在国际经验单元,多位专家围绕各国家政策及其效果展开论述,并特别关注了性别平等在家庭政策中的重要性。

基于法国家庭政策的内在推动力研究,山东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吴真提出,在传统家庭制度一去不复返的时候,生育已经不能再用强制的、惩戒的、鼓动的手段来推行,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主行动才是更重要的原动力。所以,尊重不同个体多元选择,为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提供便利和保障,才能帮助个体找回他们作为人的生育的自由、生育的权利和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的生育的本能。

在北欧一些国家,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一直很高。来自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妇女研究室的学者石鑫系统分析了北欧完善的儿童照料政策,着重强调了北欧在家庭政策方面的平等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女性主义,指出提高政府参与及强调性别平等在生育政策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年学者龚顺则带来了日本家庭政策效果的问卷调查实验研究,同样证明了性别平等本身不仅能提高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意愿,也会与家庭政策产生良性的交互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春华重点关注了欧洲儿童照料政策中完善的非正式照料,她指出,中国仅依靠正规的儿童照料无法满足现有需求;如果中国家庭在儿童照料方面能够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可能会对他们的生育意愿、生育数量选择和未来预期产生积极影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高翔则分享了美国儿童照料政策,指出政策设计需要考虑不同政策目标内在逻辑的协调,区别不同类型个体的行动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典在总结时指出,欧美各国儿童照料的相关政策反映了其背后社会理念的差异。我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期待我国充分考量多重现实因素,不断形成、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

观点秀场

话语赋权之后:脱口秀节目如何释放女性力量

· 阅读提示 ·

近年来,脱口秀节目中的女性身影与女性议题比重越来越高。基于对《脱口秀大会》等热播节目的分析,本文作者认为女性借助脱口秀舞台进行自我表达,拓宽了女性话语表达的社会空间,打破了传统媒介和男性话语空间中的女性刻板印象;而媒介能否在更多元的社会议题中体现女性价值,是话语赋权之后女性力量得到有效释放的关键。

■ 郭静 肖辉馨

诞生于网络语境的脱口秀节目颠覆了传统媒体时代的话语表达模式,以独特、直白、锋利的言语特点收获了广泛关注。近年来,脱口秀节目中的女性身影与女性议题比重越来越高。从《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出现1位女性脱口秀演员到第四季出现11位女性脱口秀演员,甚至出现全女性阵容的《听姐说》《姐妹们的茶话会》等脱口秀节目,女性借助脱口秀舞台进行自我表达,拓宽了女性话语表达的社会空间,打破了传统媒介和男性话语空间中的女性刻板印象。

眼下热度较高的脱口秀节目作为一种媒介表达的形态,被翻译为“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意指单个演员在台上表演幽默段子的有文本的现场喜剧表演形式。单口喜剧最初萌芽时是男性的舞台,女性表演者和观众始终缺席,男性演员的表演内容带有明显的男性中心倾向。社会性别与发展理论认为,女性话语赋权是改变传统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重要手段。脱口秀节目中日益活跃的女性表达呈现了女性对获得话语赋权的主动性。



打破传统性别秩序:女性主体话语的出场

在脱口秀节目中,女性脱口秀演员文本创作的逻辑起点,多数围绕在外貌焦虑、年龄焦虑、婚姻困境及社会期待等方面。如李雪琴的“我找对象就比较困难,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颜怡颜悦双胞胎的“你们俩好像啊,姐姐看着妹妹的时候,脸大的那个要是想躲在另一个后面,会不会看起来像日环食”等,反讽男权视角下对女性身材及容貌的审视,以及男性对女性的物化。

在以往的舆论场中,男强女弱的意识构成了传统性别秩序的核心,男性甚少处于被凝视和被指点的位上。有着“犀利主妇”人设的思文在《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总决赛中拿到季军时的感言为“大家都知道我老公程璐是脱口秀大会的首席编剧说明这个节目真的没有黑幕”,而程璐在自认“软饭男”时也表示“我爸妈对思文比对我好,他们从来不会催思文生孩子,因为思文是家里的顶梁柱”。这段互文式脱口秀,突破了传统两性角色定位的掣肘,有效地挖掘了女性的主体



意识。此处的互文,除了互相解释与贯通外,也内含二者的表达互为整体性的概念。

“女性话题”在脱口秀节目中频频涌现,恰恰说明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长期失语状态,而脱口秀的场域则为她提供了纾解隐藏情绪的机会。

直陈苦痛:女性脱口秀叙述的“去耻化”效果

有学者认为,个人对自身经历的羞耻会产生蔑视感,从而外化为过于苛刻的自我评价。在2020年的跨年演出中,杨笠讲述了自己做过的妇科手术——子宫内息肉切除术。杨笠说自己去摘除子宫内息肉肉时,遇到的虽然是男医生,但整个治疗过程非常专业,“那一刻是我今年感受最好的一刻,我已经不只是一个女人了,我就是一个人,就想活着。”在麻醉效果显现前,医生问她感觉如何,杨笠的回答是“我现在感觉自由”。

而类似的表达在亚裔女脱口秀女演员——韩裔赵牡丹(Margaret Cho)和中越混血的黄阿丽(Ali Wong)的脱口秀演出中更是比比皆

是。赵牡丹在舞台上讲述12岁的自己被性侵,且不被家人理解和遭到同学嘲笑,替有此类经历的女性发声;黄阿丽的核心故事则围绕分娩、喂奶、换尿布过程中的种种艰难,落脚点为生育带给女性的身体负担。

当女性用一种开诚布公的直白话语公开谈论自己的私密体验时,脱口秀这种媒介呈现形式在无形间达到了去耻化的效果。女性脱口秀演员叙述的内容是痛苦的,表达方式是戏谑的,她们没有刻意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去呼喊性别平等,而是直陈真实的性别认知和生命体验。

娱乐之外:在多元社会议题中彰显女性价值

对话和沟通,是以语言为主要呈现方式的网络综艺节目的终点。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脱口秀演员崭露头角,除了呈现社会关注度高的性别议题外,能否在更多元的社会议题里彰显女性价值,是话语赋权之后女性力量能否得到有效释放的关键。

对此,有的脱口秀节目也在试图延伸议题的广度与深度,将娱乐性和思想性融为一体,其中便暗含了女性赋权。比如《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女性领笑员,由此前的个性更为张扬的杨天真和张雨绮替换为资深但风格较为严肃的杨澜,有受众认为这是传统道德规范和思维模式在综艺节目中的回归,甚至直言杨澜一本正经的态度与《脱口秀大会》的“画风不符”。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作为领笑员团队中唯一的女性,杨澜身上可挖掘的女性角色更为丰富立体——妻子、母亲、女性媒体人、女性创业者、女性领导者等,在重塑女性力量的同时,也可以巧用“性别视角”,提供了打破圈层的可能。比如有女选手咬牙切齿地吐槽老公穿着土而所有观众都在狂欢时,杨澜善意而冷静地提醒“不应该嘲笑老公的土”;有选手所学专业为“材料科学与工程”时,杨澜贡献了金句“最大利己者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块材料”。尽管《脱口秀大会》的定位之一是搞笑,但作为一档线上综艺节目,其目的不仅是娱乐大众,更要传达多元的价值观,以期通过讨论而传播正能量,借助媒介形态继续拓展女性的表达空间和自由。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

研究视窗

《妇女权益保障地方立法的创新发展及启示——以四省区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为例》

作者:薛宁兰

近期,天津、河北、江苏、宁夏四省区市相继修订本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将法规名称一律改为“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以“条例”取代“实施办法”是保障妇女权益地方法规更加系统全面的体现。赋予地方法规和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合法地位,确立提升妇女参政议政能力的具体措施、建立纠正就业歧视行为的联合约谈机制、增设父母共同育儿假,是四省区市“条例”在妇女权益保障制度机制上的创新举措。四省区市的修法实践有助于拓展地方法治空间,助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女性就业中的算法歧视:缘起、挑战与应对》

作者:阎天

与传统算法相比,当代算法自主获取信息的能力显著提升,这给反就业性别歧视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域外职场已经出现针对女性的算法歧视,中国也可能出现类似现象。现有的反就业性别歧视法主要包括“不打探”“不考虑”和“不卸责”三项规则,这些规则均无法很好地应对算法歧视。有鉴于此,治标之策是在法律和技术上逐项完善现有规则,但是收效有限,并且可能有悖于鼓励算法研发和推广的产业政策;治本之道则是在国家、用人单位、女性劳动者及其伴侣之间公平分配生育成本,消除算法歧视产生的根源。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5期

《儿童同伴游戏中社会性别分化现象的质性研究》

作者:李玲玉 林兰

性别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要素之一,也是儿童在发展中最早了解的社会性概念之一。在幼儿园中,同伴游戏是考察儿童社会性别分化现象的重要载体。本文作者对两所幼儿园中的儿童同伴游戏进行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在同伴游戏的过程中出现游戏主题选择、游戏关系建立、游戏规则制定三方面的性别分化现象;在以中产阶层为招收对象的幼儿园中,幼儿同伴游戏表现出性别固化的现象,而以流动儿童为招收对象的幼儿园中,幼儿同伴游戏表现出性别双向化的趋向;以游戏为载体,男孩群体和女孩群体生成的同伴文化具有相异的社会性别特征;以不同社会背景为基点,成人文化对于儿童性别观念和行为的塑造影响显著;在全球化背景下,大众传媒对儿童社会性别分化产生影响。据此提出以下建议:鼓励儿童在同伴游戏中进行跨性别活动,体验不同性别群体的行为方式;重视儿童的同伴交往对社会性别分化的影响;提升成人性别平等的观念,为孩子树立良好榜样。

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范语晨 整理)